

论跨文化交际范式的中国化创新

翟石磊, 宁淑梅, 谢 刚

(中国矿业大学 国际煤炭能源政策研究中心,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传统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理论具有明显的美国特色,以研究移民文化适应作为主要问题。中国“一带一路”实践中形成的跨文化交际是一种创新范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平等性取向更加突出。美国的跨文化研究范式渗透着西方与非西方、我者与他者、核心与边缘文化的关系,这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无法解释跨文化对话行为的本质特性。中国创新范式首先就是要超越“冲突主义”的文明观,倡导多元文明共生的原则,鼓励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多元价值共存和文明间对话主义。其次是坚持超越个人主义的国家主义原则,正确看待政治文化认同差异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第三就是要超越文化“排他主义”和去“中心化”,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去美国化;一带一路;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3-0018-08

一、背景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大国长期主导着国际文化交流的议程与渠道,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对话的边缘或半边缘状态。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逐渐打破了“西方”国家对国际文化交流的垄断局面,倡导文明多元性与多元文化共存的全新跨文化对话格局日渐形成。^①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跨文化对话机遇,也是对中国是否具有对话世界话语能力的考验。习近平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其基础条件是了解中国,懂世界,同时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即将开启,特别是全球化领导

权和话语权即将发生重大逆转关键时期,中国是否准备好对话世界的跨文化话语能力与未来深度、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有着紧密的关系。

自2013年以来,由中国政府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积极响应,并已经在国际贸易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诸多的发展。就范围而言,“一带一路”涵盖亚、欧、非三大洲。根据由近及远的原则,横穿整个亚欧大陆的“一带”,在空间范围上可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核心区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扩展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蒙古、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等9个国家;辐射区包括西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并且可连通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1]从文明分布看,“一带一路”沿线国主要包括中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等主要文明。具体到宗教层面,又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等。在方

[收稿日期] 2016-12-20

[基金项目] 中国矿业大学科研平台项目“当代中国能源走出去的国际政策和舆论环境研究”(项目编号:2013KYPT04),“以培养具有能源知识背景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为导向的课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YB38)以及外文学院科研创新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能源政策与能源教育国情研究”(KYTD201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翟石磊(1981-),男,江苏邳州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与传播,国际舆情,英语教育研究。

汉文教授看来,“一带一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文明融新的实施方式与实践。^[2]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世界新型经济体,也有经济欠发达国家;既有南方国家,也有北方国家。从政治体制角度看,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从国家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既有中国传统友好邻邦,也有因为诸多原因与中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纠纷的国家。从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情感沟通方面而言,依旧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③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如此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国家落地,如何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如何维护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都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无论是以上哪个方面中国与大部分国家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国家与历史上任何区域经济合作模式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一带一路”既是一次历史创举,也是超越政治模式、经济体制和文明的国际合作。习近平提出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精神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国民之间的交流 and 理解十分契合。因此,面对这个历史性的创举,我国学术界有责任去思考如何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民众之间跨文化对话,以及如何维护各国民众之间的友好关系。本文作者在对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分析基础上,提出超越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中国方案,并就执行的可行性和基本原则也进行了探讨。

二、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

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式或模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也就是说,“范式”是对学术研究的对象、价值导向、理论基础、操作方法、研究目标等问题进行了规范与设定。具体到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首先需要明确“跨文化”与“交际”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跨文化”(无论是 cross 还是 inter)是一个学科,不如说这是一个综合的研究视角;交际(communication)则是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一个系统理论下的学术概念,具有其稳定的概念体系和明确的学科归属。在传播学(无论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communication 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3]从最一般意义上讲,communication 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属性。恰恰是“跨文化”赋予其至少两个文化语境下的含义或属性。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和关键是“跨文化”,这属于“道”的层面问题;而“交际”则更多是“器”的层面问题。“跨文化”具有决定性和基础性意义,“交际”则具有表现文化和信息交换的意义。

作为专门研究公众、组织或国家作为行为体而进行跨越文化的交流理论,跨文化交际学^④发端于、发展于美国。无论是从其学术理论体系、概念体系还是价值判断标准来看,都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色。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最初需要面对的是国内外两个局面。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落实战后安排,推行“国际人道主义”,美国政府决定向海外派遣和平队(peace corps)。这是一支主要由美国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派遣队,其主要任务是对海外国家进行“援助”,以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保证任务的有效开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在今日,美国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军事、经济、文化等利益,国际人员往来和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国际使命至今依旧持续,在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公共外交中,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在内地各

①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World Report Investing i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2009.

②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

③ 刘长敏在对俄罗斯与中国接壤边界地区的考察中提出,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状况基本良好,双边的边贸关系发展面临挑战,两国民众特别是边民间的认知尚待深化。见:刘长敏:中俄东部边界近距离观察与思考,《太平洋学报》,2016,(3)。

④ 跨文化交际的英文是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该研究最初由英语学科研究者引入并主要应用于外语教学研究中,并将其翻译为跨文化交际。但是在公共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跨文化交流或沟通成为经常使用的属于。而在新闻传播领域,跨文化传播则是该英文对应的中文词汇。因为学科背景的差异,在中国形成多种多样的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研究。本研究暂且使用跨文化交际,以便于表述。

类美国组织一直通过跨文化对话活动,落实各种美国政府在本地区的安排。在国内,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国民具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联系。但是美国的文化属性又以 WASP(即所谓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的、新教作为主体宗教)为主体特性。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美国国民如何相处一直是美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形式上看,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语言、文化信念、行为准则等方面都源自“主流”文化(即 WASP 文化)。已故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 1993 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夏季号季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该学说倡导从文明冲突的视角解释发身在人类历史和当时世界的冲突问题,随即引起全世界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在 2001 年“9·11”事件以后,他又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在这本著作中,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美国文化的根本特性,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4]而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期间所宣扬的“美国正统文化论”以及收紧“移民”政策的言论和行为恰恰是亨廷顿观点的现实写照。特朗普所宣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竞选口号背后,揭示的一个日渐衰老帝国背后的文化排他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植根于移民文化,是基于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为主体,多种种族之间的跨文化对话。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认同美国作为国家,以及认同美国 WASP 作为主流文化的前提下,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进行的跨文化互动。这对于如何认识西方与非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提出了现实的反思。

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推进者威廉·古迪孔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从学术发展视角对美国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综述。他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不仅是一门交叉学科,同时更是一门面向现实、面对跨文化冲突与合作的一个研究领域。他从传播学、人类学、交际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言语层面、深层的价值观与信仰层面、以及行动层面等问题,提出了针对“多元文化交汇”环境下的

跨文化对话理论阐释视角与规则。^[5]

从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来看,跨文化交际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即本质主义或个性主义(essentialism)和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cosmopolitanism)。本质主义强调宏观文化或族群文化对个体文化养成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其发展的新本质主义(neo-essentialism)对于文化的整体性、国家性和社会性给予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比如,作为跨文化模式研究的代表,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并日益完善的跨文化交际文化价值观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理论范式凸显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甚至不可比较性。文化相对论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与本质主义不同,世界主义更加强调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差异的相对性,主张个体间开展积极的跨文化对话。作为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批判世界主义(critical cosmopolitanism)从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出发,指出处于文化体系核心的国家和地区对处于外围的国家文化的支配性和影响力,认为这是中心—边缘之间的对话,本质是上西方—非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对话。无论如何强调文化多元与差异性,以及文化对话的必然性,都必须让非西方文化具有自己的声音。^[6]

以上两种跨文化理论均存在于世界不同领域或区域的跨文化对话行为之中。比如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多民族、多种族的移民国家中,世界主义理论更加具有实用性,因为这不仅关乎美国既有族群对美国社会的认同性和对美国国家的认同性,同时也对潜在的移民具有极大的引导性和教育性。

当前,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是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浪潮中的全新国际合作模式。这既不是一个实体组织,也不是地区联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具有着多元、系统的文明体系。中国如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民众进行跨文化对话,在对话主体、价值观基础、对话目标、世界观导向等方面与美国跨文化交际范式具有显著的区别。

首先,交际主体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要面对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而不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移民。在跨国界、跨文化商务交流、政治交流和人文对话进程中,交际者对彼此的语言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预设,也对于交往对象的身份属性与自我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认识。在多重身份中,国家身份认同是跨文化交际的起点,这是与美国移民文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中身份认同过程最为显著的区别;其次才是文化身份的

差异,即交际者在寻求共享文化的同时,也会明确地认识到文化的差异,并努力寻找对话的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包括政治外交、公共外交或其它形态的交往,并不是寻求“一国”对另一国或区域的文化影响,甚至“文化制衡”;而是通过促进各国之间人文互动而促进经贸、政治、安全合作。并且,这样的举措也不是发生于某种重大全球或地区政治变化之后,而是在和平时期的合作倡议。这都区别于美国跨文化交际产生的现实与历史土壤。

第二,价值观基础不同。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内在价值基准是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导下的价值观,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的价值观背景则具有多样性、区域共同体特征。在美国研究范式中,如何认识文化的深层结构存在多种理论。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针对不同文化群体对空间距离的感知差异提出了跨文化语境下的高、低语境文化模式,这一论断也一直被视为西方(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基础。跨文化管理研究学者霍夫斯特德(Geert Hofstede)将文化价值观的分析维度划分为五个,即: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高度不确定性规避与低度不确定性规避、高权利距离与低权利距离以及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7]。此外, Kluchhohns and Strodbeck 围绕人性善恶、人与自然关系、时间取向、行为取向等提出了不同的文化维度。^[8]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价值观起点是基于个体主义,并进而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并达成个体优先于集体的共识;在“个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上,美国跨文化研究者也倾向于强调个体与上帝对话的独立性。这与美国早期定居者的经历和新教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的理论同样渗透着价值观的“二分法”,这也是美国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具体表现。美国已故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的世界文明之间存在断层线(fault-line),主张文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同时又预言伊斯兰文明最终将于西方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中华文明将加入伊斯兰文明的阵营,最终西方是最后的赢家。^[9]这属于典型的美国式的文明思维,也是美国社会主流价值

观深层所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的直观体现。事实上,在二元之外还应有多元、差序价值观格局。

然而,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合作倡议,跨越了儒家文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此类区域文明共同体与美国社会的多族裔文化具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儒家文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明与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有着极大的不同,和谐、共生、整体、差序等理念更为这三类文明所接受。“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第六波,2015 年)调查数据显示,从两组价值观(即,传统价值观与世俗理性价值观,基本生存与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分布区域和趋势来看,中国(儒家文明)与非洲—伊斯兰文明在生存与自我表达价值观上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即,依旧以生存(survival)为主。同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中东欧、部分西欧国家、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等也基本以生存价值导向为主。这明显区别于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但是,也必须看到,在传统(即宗教性)与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上,中国属于高度世俗化—理性化价值观取向,而非洲—伊斯兰地区则属于高度传统社会。这一方面也是中国开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跨文化对话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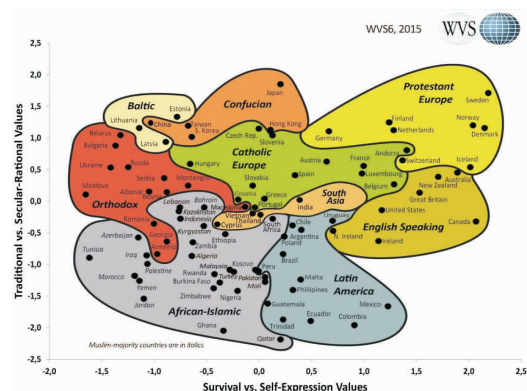


图 1 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

Fig. 1 Inglehart - Welzel Cultural Map^①

第三,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功能与目的存在差异。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最终是服务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入于一种共同的文化模式中,因此其对交际语言(语言和非语言)、语言和文化禁忌、身份建构(更加突出文化身份而对国家身份提及较少)等方面强调向共同的文化模式——美国主

① Inglehart - Welzel Cultural Map,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统计图表中,统计者将台湾和香港作为于中国并列的统计单位,违背了一个中国立场,本研究不赞成,但为了完整展示研究引文,故不做修改,仅作说明,全面的调查报告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ontents.jsp>

流文化模式——靠近。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一方面主张尊重文化多元性,尊重少数族裔的文化背景,但同时又不断强调以英语作为社会交际语言媒介下的文化同化行为,即“涵化”与“融入”问题。并且提出了从“跨文化冲突”到“跨文化适应”的发展过程,其中融入或适应新文化环境的主线就是对主流文化模式的接受与认可。事实上,这是一种主张美国社会中的“弱势文化群体”以“社会适应”为目的的“文化剥离”过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些具有“非 WASP”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在经历了适应过程之后,以及后来的二代、三代传承以后,其与母国文化的纽带基本就被完全弱化掉了。

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并不是以弱化或消除彼此文化记忆作为目的的行为。事实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的交流,更多不是为了移民到某个国家生活,而是基于共同的“交换”需求而发起的跨文化行为。他们更加强调公平、独立、互动和互利。因此,对于这类跨文化交际发生的动机、场景、内容和效果期待也明显不同于美国范式下的跨文化交际。交际者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优先于文化身份认同;由于不存在所谓的主流文化,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文化差异的容忍性也要更高一些。

第四,世界观存在差异。美国范式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缺乏家国情怀。美国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属于实用主义,个体利益、平等对待、物质追求、科技崇拜、竞争意识等都体现着美国人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与个体利益的维护与实现。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也始终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追求实用主义价值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始终具有优先地位。美国国家的认同基础并不是共同的国家历史记忆或族裔共同体意识,而是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美国信条”以及美国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家国情怀是被弱化、甚至割裂的。这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具有着本质的区别。“集体主义”或“家族主义”的缺席使得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对话的需求,也往往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印度或伊斯兰国家公众在国际交流中如此重视家庭、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以及为何这些地区的公众更乐于将个人与国家发展融为一体。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基于移

民文化和海外“软实力”战略而形成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并不适用于“霸权缺席”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交际是一种新型的跨文明、跨文化对话,这需要我们怀有文化大视野和多元文明观;需要我们从“美国不在场”的角度重新审视跨文化交际研究。

三、发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可行性与原则

从交往历史、现实需求和学科及人才储备等方面来看,发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的跨文化交际范式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第一,从交往历史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存在着 2000 余年的交流历史。自秦汉以来,中国与西域地区存在多元、深层次的来往。在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留下了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历史记录。收藏在江苏省徐州市汉画像石博物馆中的汉画像石—胡人玩杂书向今人展示东汉时期的“胡人”技艺和来自罗马的建筑艺术对中国的影响。^①中国引入了印度的佛教,伊斯兰教也较早地传入了中国。自隋唐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进入了活跃期,包括中国人下南洋和郑和下西洋等重大历史事件推动了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融合。自明清以来,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跨文化交际开始日趋频繁和深入。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将中华文化带入欧洲,同时将欧洲的文化引入中国,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这些交往历史为开创属于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的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参照。

第二,从现实需求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多层次对话与交流日益深化。首先,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中国国际化参与程度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海外并购与合作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旅游、读书、就业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文化使命”更加重视。马云、王健林等也多次呼吁民营企业在走出去中的文化责任与担当。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学生走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和留学生进入中国。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空转换的背景下,发展具有全

^① 该汉画像石造型为:胡人吹奏乐器,并同时表演杂技,建筑物的背景则是高大的罗马柱与中国汉代建筑的融合。

新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三,从学科基础和人才储备来看,目前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特别是英语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也主要是语言交际、语用研究和基本的文化差异比较,很少涉及更深层次的研究。即使有一些深层文化的研究,也更多是美国研究范式的移植。突破基于英语和英美文化的跨文化研究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界需要突破的瓶颈,也是体现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体现社会价值和实现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起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具有明显的多学科属性;在学科归属方面更多设置在传播学和人类学的范畴。跨文化交际于 20 世纪 80 年初被引入中国。以胡文仲为代表的外语(英语)学者开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先河。此后,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成为诸多外语专业学生培养课程之一。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美国跨文化交际范式的选择性学习和发展,聚焦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问题,同时辅以一定的文化差异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同时中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不断深入推进,跨文化交际教学与研究具有了更加广泛的需求。以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和孙有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顾力行、华东师大戴晓东等教授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和以贾玉新、林大津、顾佳祖等教授为代表的“话语”研究学者成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要力量。当然,也有如庄智象为代表的综合性跨文化研究学者。经过 30 年的发展,跨文化交际最近(2016 年)刚刚被写进中国英语专业指南,并被视为重要的能力培养目标。但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也长期存在学科发展的壁垒,主要是新闻传播学与外语学科之间的隔阂。

在新闻传播领域,以关世杰、姜飞、单波、孙英春等为代表的学者专注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丰富了中国跨文化交际(传播)的学科内涵。也形成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中国多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多学科发展既是机遇,同时也造成了中国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研究的学科失范现象。

美国华人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实现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话,也发展了具有国际色彩的跨文化研究范式。Stella Ting-Tommey(丁允珠)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面子问题引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使得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跨

文化交际研究更有跨文化属性,也对中国本土跨文化交际研究带来极大的启示。罗德岛大学的陈国明教授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引入跨文化交际研究,将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融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提升了中国文化对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意义。张惠晶(Hui-Ching Chang)的《伶俐、创意与谦虚:华人的语言行为》一书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解读华人跨文化语言行为,体现了华人视角、华人问题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10]此外美国普渡大学的贾文山教授也在从事跨学科角度突进华人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传播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开展跨文化交际研究已经具有较好的学科基础,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和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特色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基础。

因此,笔者认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跨文化交际,必须走出美国研究范式,突破传统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意识形态束缚,形成具有去美国特色的新型跨文化交际范式,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面向“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交际要超越“冲突主义”的“二元”文明观,倡导多元文明共生的原则,鼓励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多元价值共存和文明间对话。开展面向“一带一路”公众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要综合考虑沿线国文化、宗教、政治等多方面间的异同点,求同存异,形成跨区域、跨国家、跨文明的研究范式。中国已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倡导文化自觉,主张“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跨文化对话准则。中国与伊斯兰教文明和印度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共同之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因此,这应该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历史文化基础。超越“冲突主义”,就是要超越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跨文化交际冲突必然性”论断,主张和谐与对话、文化间互谅和文化移情的理念。

第二,超越个人主义的国家主义原则。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取向,目的是促进个体融入于群体文化。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公众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首先面对的不是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国家身份与文化身份是最显著身份,跨文化行为的国家属性优先于个人属性。尽管模式固见(stereotype)不能反映出个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当交际主体之间存在国籍和区域差异,当他们不易融入于某一特定文化作为交际目的,而仅仅是通过跨文化交际形成某种共识或行为的时候,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

意识往往会成为交际的文化准则,模式固见在这个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通常交际者之间文化差异越大,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也就越强。

第三,超越“排他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原则。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即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必须遵循西方(美国)价值规范;最核心的原则是“边缘靠近中心,多元趋向一元”。而这里的中心通常指的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元也就是美国文化。这既是基督教文化的自身属性,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对于文化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研究,都是基于美国文化作为基础,视为“主体”,其它所有文化作为比较对象,作为参照,视为“客体”。事实上,世界文明如此多样,怎么可能简单地划分为这样的几个维度?从文化感知和心理角度来讲,这里存在着浓厚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ethnocentrism)。

四、总结

文化无法摆脱固有的国家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决定性作用。从社会层面上看,尽管美国的跨文化研究强调多元文化之间对话主义,但是这样的“对话”更多是从“文化趋同”和“多元转向一元”的角度展开。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看,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其实渗透着西方与非西方、我者与他者、核心与边缘文化的格局预设。我们之所以依然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逾越基于国家和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界限,就是因为人们对文化交际普遍(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追求。而之所以出现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冲突或文化震撼、以及身份焦虑等问题,恰恰是因为来自非西方文明的交际者无法摆脱深层次的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属性与认同,无法在根本问题上协调不同意识形态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因此,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研究范式之外开辟属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领域和路径,丰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体系。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作为世界

新兴大国,作为世界主要的文明之一,需要从全球角度出发,积极对话不同文明。本研究对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的质疑与反思,并不是要否定它,恰恰相反,笔者的研究和分析始终都是围绕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把它作为思考的起点和基础。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同时美国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也为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精彩的案例和借鉴。笔者之所以不断反思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是基于拓展其研究外延,丰富其研究内涵,并使之更加适应美国本土之外的多元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美国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当事国,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美国研究范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数据,美国与欧洲(西欧)之间存在越来越明显的价值观认同鸿沟。也就是说西方世界存在越来越差异性的价值观取向。^①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研究将一直在以外语学科为主体的学科下发展,这里又引出了关于“语言与文化是否具有可分性”的问题。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讨论。笔者赞同文秋芳等学者的观点,语言和文化之间关系存在着强弱变化的区间,不能简单地将其关系定义为可分或不可分。正确地理解这个关系对开展面向非语言对象国(比如英语学科下的非英语国家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具有关键的意义。中国跨文化人才培养落后于现实需求的紧迫性,学生学习英语而忽视了对对象国历史、社会、政治等知识性理解。跨文化交际研究必须深入到对象国的语言、历史和国际关系视野中。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出,不仅是中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倡议,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崛起中”大国所必然经历的跨文化、跨文明对话之路。未来的中国绝不能再重走英美帝国全球化扩张的老路——如此中国绝无超越西方文明的可能。^[11]发展与沿线国公众的跨文化对话,中国方面需要既看到文化之间的差异,更要看到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既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更要看到中国文化的普遍性因素。这对于每一个参与“一带一路”跨文化交际的中国公众而言,都是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挑

① 笔者曾撰写《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整体——基于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实证分析》,发表于《太平洋学报》,2012年6期。同时,美国著名民调机构Pew Research(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欧洲人于美国人在越来越多方面存在差异,最主要包括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政府的角色(the role of government),自由表达(free expression),宗教(religion)以及道德观(morality),详见:5 ways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are different 2016年4月1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4/19/5-ways-americans-and-europeans-are-different/?utm_source=Pew+Research+Center&utm_campaign=14fed3c76a-Global_Attitudes_Release_7_287_31_2015&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3e953b9b70-14fed3c76a-400006685

战,更是对其多元文化意识和思辨能力的挑战。中国当前在教育领域所推进的跨文化交际教育重心依旧是语言学习与文化知识的输入层面,这些围绕社会文化层面的教育固然帮助外语学习者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但是,因为始终在美国跨文化研究范式下教育与学习,因此,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如何对话非西方公众,特别是与美国文化视野下的“他者”文化对话,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也是培养参与全球治理人才队伍的关键一环。

[参 考 文 献]

- [1] 刘海泉.“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J].太平洋学报,2015(2).
- [2] 方汉文.“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新之道[N].苏州日报,2014-12-19.
-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
- [4]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谁是美国

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 [5] William B. Gudykunst. Theori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 and II [J]. China Media Research, 1, 61-75, 2005.
- [6] Adrian Hollida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deology[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9 Dec. 2010)
- [7]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8]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M]. Wadsworth Publishing; 13 ,2011.
- [9]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M]. Simon & Schuster; 1 edition 1998.
- [10] 张惠晶.伶俐、创意与谦虚:华人的语言行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 [11] 张文木.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谈谈“一带一路”的政治意义[J].太平洋学报,2015(5).

(责任编辑:程晓芝)

On Chinese Innovation Within the Paradigm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AI Shi-lei, NING Shu-mei, XIE Gang

(Research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Coal Energy Policy,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obvious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with it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immigr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innovative paradigm with more prominent orient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equality. It is not universal and can not explai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that the America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permeated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non-West, self and others, core and marginal cultures. First and foremost, China’s innovation paradigm is to go beyond the civilization concept of ‘conflict’, advocate the principle of co-exist multiple civilizations, and encourage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values includ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dialogu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addition,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sm over individualism, and have a correct view 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 What’s more, it sticks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by surpassing the “cultural exclus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Key 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e-American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Diversity